

为了悲剧不重演……

沧桑十年

马识途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沧桑十年

马识途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沧桑十年/马识途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1

ISBN 7-5035-1890-1

I. 沧… II. 马… III. 马识途 - 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3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70 千字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33.00 元



最高指示

报刊资料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1966年11月28日

重庆日报资料组编

(共8版) 第16期

(供报社内部参考)

全国各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点名批判文艺界对象简介

编者按：这份资料是《文汇报》资料研究部编的。它辑录了文化大革命两年多来，全国各报公开点名批判的文艺界对象的姓名、前职和各报点名批判日期。现翻印，供同志们参考。

文艺界修正主义头目

姓名	前 职
陆定一	旧中宣部部长
阳一非	旧中宣部副部长
林默涵	旧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
夏 衍	旧文化部副部长
齐燕铭	旧文化部副部长
张致祥	旧文化部副部长
肖望东	旧文化部副部长
陈荒煤	旧文化部副部长、电影局局长
刘白羽	旧文化部副部长、前全国作协副主席
邵荃麟	前全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阳翰笙	前全国文联主席、《北国江南》炮制者
田 汉	旧文化部部长、剧协主席

各报点名日期

人民日报1967年4月1日

人民日报1966年7月4日

最高指示

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无产阶级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马识途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

(供批判用)

中国科学院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兵团《批斗马识途联络站》编印

一九六八年九月于成都

原稿指示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的革命事业能够胜利地进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什么个人利益不应当牺牲，还有谁的利益不能抛弃吗？

(1970年6月23日)

我的检查 ~~草稿~~ (草稿)

我是 ~~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 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第一号犯 ~~马洪~~ ^{马洪} 的人。我是押毒。科学院多年的工作中以及在其它工作中，犯有与党中央道路上的严重错误。几年来经过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经过前革委、前革委二室队、四室队的耐心教育和教育，我进行了长时间的检查，反省，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障碍，才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我的错误属于 ^{马洪} 有损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反对了毛泽东思想，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以 ^{马洪} 应当受到 ^{马洪} 的批评教育。我在以下六个方面犯有 ^{马洪} 的错误：
1. 是科学技术工作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端心息虑，诚恳接受大家的帮助和教育，在更深远的革命道路上，和我的无产阶级知识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结合。我期待我早日能继续革命，我决心继续地革命。这就是我今天工作的宗旨。

最后让我高呼：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最、最、最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马洪
1970年4月30日

我的初步检查

马思聪

这些天来，在同志们热情的揭发批判和帮助下，我开始来对自己进行再认识再批判。我~~不是不承认~~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文艺家，我在反对革命和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够远了。承认这个结论是痛苦的，经历了十分严重的自我思想斗争，但是客观事物是存在的东西是无论否认的，写了那么大一堆东西，起了那样毒毒草，大家揭发批判这样多，口诛笔伐，坐牢站监狱，我还有什么可^{相称}的。恐怕承认，但是又不愿不承认，这就是我今天心理状态。

我现在就大家已经批判的几棵毒草来进行一个初步的自我再认识，自我再批判。因为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所要求的，所以必须做好。

彻底揭发批判馬識途所推行的 资产阶级科学研究路线

“馬識途是周揚黑帮的一个急先锋”

——从馬識途的两次讲话看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嘴脸

把馬識途所放的一切毒草彻底铲除干净

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而斗争

——揭穿馬識途所谓“政策的限制，任务的逼迫，理性的驱使”的反动本质

馬識途向來受到許許多多
的讚揚，但最近幾年來，
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
泽东思想的嘴脸，却越
来越暴露出来了。最近，
他又在《光明日报》上，
发表了“政策的限制，任
务的逼迫，理性的驱使”
的讲话，这是他在反党反
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方
面，又一次严重的反党反
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罪行。

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纷纷开会和写大字报

愤怒揭发和批判馬識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馬識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他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方面，又一次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在这次讲话中，公然攻击党的政策，攻击党的任务，攻击党的理性，这是他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方面，又一次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在这次讲话中，公然攻击党的政策，攻击党的任务，攻击党的理性，这是他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方面，又一次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彻底铲除馬識途所放的一切毒草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铲除馬識途放出的一切毒草

质问省文联党组

你们压制和烧毁群众批判馬識途的毒草的来信来稿，居心何在？

不准馬識途丑化工人阶级

粉碎馬識途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批判馬識途的短篇小说《最好的办法》

成都群众一建厂工程局工人 李廷军

馬識途的短篇小说《最好的办法》，是他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方面，又一次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在这次短篇小说中，公然攻击党的政策，攻击党的任务，攻击党的理性，这是他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方面，又一次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粉碎馬識途反对突出政治的罪恶阴谋

馬識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他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方面，又一次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在这次讲话中，公然攻击党的政策，攻击党的任务，攻击党的理性，这是他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方面，又一次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马识途《沧桑十年》序

季夏林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眼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的责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研究一下它产生的原因，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亲身陷入这场浩劫的人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青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是“海客谈瀛洲”，他们决不相信的。在另一方面，许多真正蹲过牛棚，受过迫害的人们，

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记忆中那些极可宝贵的经历，特别是受迫害的经历，随着他们的消逝而永远消逝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损失，决不是个人的问题。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气候和环境一旦适合，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会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出版了我写的《牛棚杂忆》。我的主要论点是：不管是打、砸、抢者，还是被打、砸、抢者，我们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前者是胡涂油蒙了心，做出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后者是在劫难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丢掉了性命。我自己属于后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跳进了牛棚，险些把小命丢掉。然而我却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还在拥护“文化大革命”。这不也是胡涂油蒙了心吗？

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犯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犯了以后怎样对待。对待之方，不出两途：一是掩盖，一是坦率承认。前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结果是往往的自食其果。到了以后某一个时候，旧病复发。轻则病魔缠身，不能自脱；重则呜呼哀哉，终天抱恨。我个人认为，聪明人，还有点良心的人或组织或国家民族应采取后者的态度。中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

人皆见之。”蚀过之后，天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之光辉。

“文化大革命”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里，有两类人至关重要：一类是害人者，一类是被害者，那一群广大的旁观者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应该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对那些害人者也应该区别对待。绝大部分是由于胡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对这种人，我只期望他们返躬自省，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做人会有极大的好处的。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则应另当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们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当年我在德国曾参观一个法西斯集中营，一位当年的“犯人”而今天是幸存者告诉我们说：“一位法西斯看守人员，每天晚上必须亲手枪毙一个‘犯人’，陈尸床下，他才能在醉醺醺中睡去，否则就睡不着觉。”中国十年浩劫中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这个法西斯有何区别！畜生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来吗？然而，这一小撮人，虽然当年被划为“三类分子”，而今却一变而飞黄腾达，有的竟官据要津了。难道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伏的癌细胞吗？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实际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做了，也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受害者了。这些人是“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他们有幸成为这一场空前的、千载难遇的悲剧的参与者。其中有一些“自绝于人民”者，无从追踪了。我们这一些厚着脸皮活下来的人，决不应当错失良机，无所作为，否则就对不起这个上天的恩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像我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我们当年的遭遇，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宝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绝这样悲剧的再发生。

前不久，我发表了 my 《牛棚杂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极短期间竟成了一部畅销书，同一些名星、名主持人、名演员的书共同陈列在街头、巷尾、地铁、车站的小书摊上，“世间多少伤心事，到处听人说牛棚。”找我签字者络绎不绝。我舞笔弄墨一辈子，原来我并没有特别垂青于《牛棚杂忆》，写的时候也是颇为随便的。可是最近听人说，我写到《牛棚杂忆》，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的“棚友”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感到极大的失望。现在“棚友”马识途同志的《沧桑十年》可能就要问世了。马识途“棚友”的经历同我是不同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的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经历，同我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他肯写出来，对我来说，实如空谷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觉得他的写法同我不完全一样，他写得更详尽，更质直。但是我们的目的却完全一样，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
人民的一片赤诚。

是为序。

1998.6.4

前 言

在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领袖叫做“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没有人怀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纯正动机。也没有人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多么真诚和多么热情。但是把这一场革命放在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面前加以裁决，却已经有了结论。这就是中共中央于 1981 年 6 月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又说：“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同时这个《决议》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

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功勋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确实的。

这场所谓“革命”一开始，就把中国投入到一片混乱和荒诞之中，好像把中国一下拖回到最愚蠢、最荒唐、最野蛮、最黑暗的封建王朝时代里去了，一切法纪秩序和道德规范，荡然无存，一切公认的是非标准完全颠倒，所有生产都几乎停顿下来，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几乎所有的曾经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忠诚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全被打成反革命，许多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更多的人被抓被关，被批被斗，折磨得死去活来。多少革命元勋，封疆大吏，包括堂堂的国家主席和许多元帅，不明不白地死去。许多正直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弄到死无葬身之地。而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却窃夺国家大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一些跳梁小丑忽然加官进爵，上蹿下跳，浑水摸鱼，胡作非为。多少悲剧、闹剧、笑剧一幕一幕地上演，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身不由己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每个人的灵魂都作了公开的展览。而这一切却都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伟大领袖的亲自导演下上演的。这场悲剧直到他老人家撒手归天，“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才落下了帷幕。

经历过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身受其罪的人，真是终生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记忆

犹新，恍如昨日。但是，这一件旷古未见、世界少有的历史事件，问起我们的儿女辈来，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还有一点模糊印象。问起我们的孙辈来，他们却连“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也一无所知了。我的外孙就是这样，我的女儿对他说起我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听起来简直以为是在说神话，他无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如此说来，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除开从历史书中抽象地了解到一点历史概念外，他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惊人事件，他们的祖辈人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荒唐岁月。至于中国特有的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请罪”、“武斗”那些具体景象以及“跳忠字舞”、“打语录仗”、“佩大像章”、“传芒果”这种令人发笑的喜剧情节，他们再也无法想象了。若干年后，恐怕要有专门的历史考证学家来发掘、考证和注释这些中国土产的专有历史名词。这种事情在官方的文书里，在历史档案中，未必有详细的记载和形象的描写。

后世的人们谁能想象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这样的怪事？党的革命领导干部，一夜之间，统统被宣布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许多人被号称最高统帅的天兵天将的红卫兵抓起来关上，给他们的头上戴上种种帽子，给他们造出种种离奇的谣言，印出种种批判的材料，在“无产阶级”的报纸上登了出来。在那些“文明监狱”里，对那些真正的老革命恣意进行人身侮辱和非人的虐待，无休止地向贴在墙上的偶像请罪，半天半天地不叫休息，不让喝水。没完没了

的批判斗争。把你拉出去戴上几尺以至一丈多高的高帽子，还插上几尺长象征反动官僚的乌纱帽翎子，叫你身上穿上麻布，颈上挂上沉重的木板，木板上写着各种名目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常用的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走资派”。有更残酷的用铁板和钢丝挂在你的颈上，立刻叫你的颈上鲜血长流。那些天兵天将的革命派把你用根绳子牵起来，在大街上游街，后面跟着一大串像送丧似的造反派的“专政队”。还有别出心裁的，叫走资派在手里提起小锣，边走边叫：“我是反革命走资派”，“我是混蛋”，“我是……”等等他们发明的无论什么罪名。甚至有的创造性地在走资派的脸上涂上黑墨或油漆，以证明他的确是“黑帮”。如此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

总之，谁把“走资派”折磨得最惨，最有创造性，最有艺术性，谁最高明。这样的荒唐事情谁要表示反对，那就要拳打脚踢，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据说这是根据某种经典上的规定和北京来的“次高指示”。把你拉到街上去示众和游斗完了，再拉回单位细细地整治你，把你弄上台去批斗。最标准的做法就是叫你站在台上，听任“专政者”把你的身子压折成两段，使你的头快要挨着脚背了。如果听任你的头自然下垂，那就便宜你了，他们要抓着你的头发，强力叫你的头仰起来，向前方看，以便于让台下的“群众”看看你的“丑恶的嘴脸”。在这同时，要你的双手在背上倒举起来，像一个喷气式飞机的翅膀。这就是“喷气式”的来源和实际景象。

应该说这还是最常见最普通的斗争方式。在那个“英雄世纪”里，是不乏酷刑的发明家创造出各种名目的特殊斗争形式的，要列举出来，真叫罄竹难书了。多少死去活来的惨叫，多少腰断腿折、耳聋眼瞎的残废，多少不知怎么忽然失踪的善良人、忠诚的共产党人，多少待死囚徒的囹圄岁月，气坏了身体，磨白了头发。多少含恨而死的真正的老革命，多少自以为在为保卫伟大的谁，去参加“武斗”而白白死去的无知青年。多少祸从天落，殃及池鱼，横遭杀戮的无辜群众。多少被夷为平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和平民房舍。多少被抢劫、打烂、烧毁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图书资料、历史档案。谁能想象得到中国会遭到这么惨重的历史浩劫？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谁也不会怀疑发动这场运动的人，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出发，为了把中国的革命继续进行到底，是在无数善良的干部和群众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善良愿望下进行的，是在无数诚心诚意革命的青年怀抱极大的狂热下进行的。我敢说除开极少数政治投机分子和阴谋家外，上上下下，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想把中国的革命搞得更快更好，想要防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然而谁能想到竟然弄到这样的结果？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损失了成千成万的好干部，使中国白白浪费了十几年宝贵的建设时光，损失了几千亿的财富。

然而，正是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带来如此恶劣的后果，才更可怕，才使有头脑的中国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